

1. 蘇聯為何要撤軍東歐

東歐是蘇聯的勢力範圍，1989 年蘇聯駐在東歐的兵力，共有三十一個陸軍師，總共約五十六萬五千人，其中駐在東德有二十個師，共約三十八萬人；在捷克有五個師，共約八萬人；在匈牙利有四個師，共約六萬五千人；在波蘭有二個坦克師，約四萬人。過去三十年，莫斯科當局曾有數次不良的紀錄，憑藉這種軍事上的優勢，干預東歐國家的自由化運動。如 1956 年匈牙利革命、1968 年「布拉格之春」的改革運動，均遭到蘇聯軍隊的鎮壓，甚至 1980～1981 年波蘭「團結工會」(Solidarity，又譯為「團結工聯」)推動自由化運動，蘇聯也以聯合軍事演習的姿態試圖干預。

1988 年 12 月，蘇聯領袖戈巴契夫 (Mikhail Gorbachev) 在聯大演說時，首次提到比較具體的裁軍計畫，宣稱蘇聯將在未來兩年內裁減五十萬人，其中首先在 1989 年內自東歐撤走五萬人和五千輛戰車。隨後，戈巴契夫在 1 月 18 日接見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、法國前總統季斯卡 (Valéry Giscard)、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貴賓時，更進一步說明了他的裁軍計畫。戈氏表示，未來兩年內所要裁減的五十萬人，其中歐洲部分裁減二十四萬人，亞洲部分裁減二十萬人，占蘇聯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十二。此外，軍事預算將削減 14.2%，武器和軍需品的生產則減少 19.5%。

戈巴契夫何以要單方面宣布裁軍？從戈氏最近二、三年的言行，大體上可以找到下列理由：其一，戈氏想集中力量，推動他的「改造」政策，致力發展經濟，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。其二，落實他所倡導的「新政治思維」，容許社會主義的建設多樣性，戈氏一再表示，任何黨不能壟斷真理，東歐國家已有較大的自主活

動空間。其三，實現他所擬訂的「軍事準則」，該項準則於 1987 年 5 月在東柏林召開的華約高峰會議正式通過。根據此項準則，「在歐洲將武裝力量和一般軍備裁減到最低程度，即任何一方只具有防衛本身的能力，無法向對方展開攻擊。」由此以觀，戈氏顯然刻意塑造他是一位理性、可以和西方合作的克宮新一代領導人。看來，如果 1989 年克宮沒有什麼差錯，加上世局尚稱穩定，那麼 1989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恐怕非他莫屬。

資料來源：《中時晚報》，1989 年 1 月 22 日，頁 8。

2. 東歐變革的特點

繼波蘭、匈牙利、東德、保加利亞等國之後，捷克在過去一週來，也如稍早的預測，發生了巨變。整個東歐形勢的轉變，幾可用「急轉直下」和「力爭上游」這八個字來描繪；前者說明了東歐各國共黨，聲望掃地，在「人民的力量」壓力下，不得不結束「一黨專政」的格局，而使其領導地位一落千丈；後者顯示東歐人民渴望民主自由，歷經四十寒暑，終於有所斬獲。

東歐在半年之內，改革浪潮，勢如破竹，洶湧澎湃。這些均自稱「社會主義國家」，在民主化進程上，竟然有許多共同特點。其一，反對力量以「論壇」之名對抗共黨的威權，波蘭的「公民團結論壇」、匈牙利的「民主論壇」、東德的「新論壇」和捷克剛成立的「公民論壇」，它們都能有效地整合反對勢力，迫使共黨讓步而展開對話。其二，「論壇」訴求的口號大致雷同，不外乎要求自由選舉、新聞自由和結束共黨的權力壟斷，還政於民。其三，教會扮演相當微妙的角色，一方面掩護反對勢力，另一方面又充當潤滑劑，使衝突降至最低程度。其四，共黨領導階層的表現，令人感到出乎意料的理性，既未採用中共「天安門模式」，血腥鎮壓，反而以更換新血，澈底改組黨政領導結構，承諾加速改革步伐，來爭取人民信賴。目前，東歐八國當中，只剩下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這兩個國家，依然抗拒改革，堅持史達林（**Joseph Stalin**）主義。不過，從最近羅、阿兩國領導人的談話看來，愈形孤立，感到憂心忡忡。布加勒斯特正面臨經濟惡化和異議分子伺機而起的雙重壓力，危機四伏。迪拉那（**Tirana**）在慶祝建國四十五週年時，正式宣布大赦，試圖收攬民心，似有擺脫長久推行

鎖國政策的跡象。

很顯然地，東歐的變革證明二項事實；其一，社會主義體制宣告破產，已為人民所唾棄。其二，共產黨已能面對時代潮流，改變體質，由國家社會主義轉換為民主社會主義。

資料來源：《聯合晚報》，1989年11月29日，頁2。

3. 歐洲冷戰結束的標誌

戰後一直被譽為保障歐洲和平的基石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，於 1990 年 7 月 5、6 兩日倫敦召開高峰會議。

在這次會議中，達成下列重大共識；其一，倡議《和平聯合宣言》，由北約和華約簽署一項《和平聯合宣言》，保證所有簽約國互不侵犯。其二，邀請戈巴契夫（Mikhail Gorbachev）和其他華約國家領袖到北約理事會發表演說，加強對話。其三，由北約秘書長專程赴莫斯科，簡報北約高峰會的結果。其四，調整 1967 年以來所堅守的「彈性反應」戰略，修訂核武是「最後手段」的武器。其五，削減傳統軍力，限制東西德統一後的軍隊規模，北約並放棄「前進防禦」策略。其六，提升「歐安會」的角色，俾更有效地促進歐洲安全秩序。因此，這次北約高峰會議被視為 1949 年成立以來最重要的會議，等於正式宣布了東西方冷戰的結束。

這個包括有十六國成員的集體安全聯盟，其所以在此時此地作出歷史性的決定，主要原因有三：（一）1989 年下半年，隨著東歐民主浪潮的衝擊，東歐共黨政權陸續垮台，華約組織形同虛設，已不再具有威脅性。（二）東西德的統一進程出乎意料地提早到來，東西德原本分屬不同的軍事集團，如果統一後顯然改變了華約與北約維持了三十多年的均勢。莫斯科對這種重大變化，自然有其安全上的考慮，不會輕易同意統一後的德國留在北約體系內。（三）蘇共正在召開「二十八大」，黨大會保守派來勢洶洶，對戈巴契夫的內外政策諸多不滿，恐危及戈氏領導地位。西方國家趁此機會，向莫斯科伸出和平友誼之手，不但可化解保守派無

的放矢，同時也助戈氏一臂之力，消除蘇共和軍方的憂慮。

在歐洲，冷戰是因史達林（Joseph Stalin）把東歐關進鐵幕，迫使東歐國家建立紅色政權而發生。如今，東歐的共黨政權已經由自由選舉遭人民唾棄，因而結束了四十年的冷戰。不過，在亞洲共黨政權不垮，冷戰仍難落幕。

資料來源：《聯合晚報》，1990年7月10日，頁2。

4. 「悲劇的波蘭」不能光靠「英雄本色」！

如何克服經濟危機？
如何整合團結工聯？
如何迎接明春大選？

波蘭總統第二回合的選舉根據民意測驗顯示，「團結工聯」（Solidarity）領袖華勒沙（Lech Walesa），以百分之七十七對百分之二十三，獲壓倒性勝利。華氏的競爭對手提明斯基（Stanislaw Tyminski），在這次的得票率，較前為低，究其原因有三：其一，波蘭影響力最大的天主教會公開支持華勒沙；其二，總理馬佐維茨基（Tadeusz Mazowiecki）及其支持者也表明態度，支持華氏；其三，波蘭的民族意識顯著覺醒，認為讓一位陌生人來領導，無異是一場「國家的災難」，是波蘭人的奇恥大辱。

無疑地，華勒沙的時代即將到來，可於 1990 年 12 月取代在九年前迫害他的敵手賈魯塞斯基（Wojciech Jaruzelski），而成為波蘭有史以來第一位直接選舉的總統。這位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出身的電匠，將如何領導波蘭度過重重危機？擺在他面前的當務之急，至少有下列三項：

第一，如何克服經濟危機：目前波蘭的外債超過四百億美元，國民生活水平降低，人民購買力下降百分之四十，工業生產也下降百分之三十，失業率百分之七。華勒沙在競選時許下諾言，要帶波蘭人快速度過難關，恐怕很難辦到。

第二，如何整合「團結工聯」的分裂局面：由於華勒沙急著要當總統，搞得昔日「團結工聯」的親密戰友，紛紛求去，另起爐灶，由馬佐維茨基領導的「民主聯盟」態度堅定，將扮演盡職

的反對黨角色，華氏重整「團結工聯」的力量，如何化阻力為助力，實非易事。

第三，如何迎接另一次大選：甫於 1989 年 6 月半自由選舉產生的波蘭國會，將在明春重選，因為「團結工聯」已四分五裂，加以有五十餘黨參選，多黨鼎立的局面，顯已造成，「團結工聯」已不易在下屆國會控制多數。

波蘭這個民族，夾在日耳曼和俄羅斯兩大民族之間，在歷史上予人有「悲劇的波蘭」深刻的印象。在這次總統選舉時，一開始亦留給人們這種感覺。華勒沙能領導這個多災多難的波蘭走向光明的坦途嗎？答案是一項艱巨的工程，不是光靠「英雄本色」即可勝任。

資料來源：《聯合報》，1990 年 12 月 14 日，頁 9。

5. 華沙起義五十週年回響

波蘭處在中歐廣闊平原上，東西分別與俄羅斯和德意志兩大民族為鄰。由於在歷史上曾遭遇過這兩個深具擴張主義的鄰邦四度瓜分，因此，史家乃稱波蘭人是個「悲劇的民族」，有多次亡國之痛。

歷史教訓殷鑑不遠

波蘭第四度被瓜分是在 1939 年，當年 8 月 23 日希特勒和史達林（Joseph Stalin）簽署互不侵犯條約和秘密協定，暗中相互勾結，劃分東歐勢力範圍。一個星期之後，納粹德軍即長驅直入，大軍壓境，很快就控制首都華沙，蘇聯紅軍也隨即占領波蘭東部。波蘭在第二次大戰期間，可謂損失最為慘重，光是兵員和平民喪亡高達四百五十萬人。其中波人在德軍占領期間，為了反抗納粹法西斯的殘暴統治，有過二次較大規模自發性可歌可泣的抗暴運動：即 1943 年 4 月，猶太人群起對抗「蓋世太保」的暴行和 1944 年 8 月 1 日華沙民眾奮勇起義，與納粹德軍決戰六十三天，因後援無繼，慘遭殲滅。前者共有六萬多猶太人在這次抗暴行動中陣亡；後者，則有超過二十萬人在這一場戰役中死亡（包括二萬餘德軍）。波蘭政府為了喚醒世人記取歷史教訓，特別於 1993 年和 1994 年隆重舉行五十週年紀念追思，尤其後者最受矚目。

德俄態度不同回響

波蘭政府和民間團體為了紀念華沙起義五十週年，早在一年前即開始籌備，專函邀請德、俄、英、美、法等國領袖參加紀念大會。屆時應邀出席的計有：英國首相馬卓安（John Major）、德

國總統赫佐格（Roman Herzog）、美國副總統戈爾（Al Gore）、法國參議院議長莫諾里，以及俄國總統葉爾辛（Boris Yeltsin，又譯為葉爾欽）的特使總統府辦公室主任費拉托夫等人。在 1994 年 8 月 1 日的紀念大會中，最受波蘭人民側目的兩位來賓，就是德、俄兩國代表。德國總統赫佐格以謝罪之心，再度向波蘭人民道歉，請求寬恕過去德人對波國的一切暴行。赫氏表示，德、波兩個人民「需要諒解、信賴、和睦相處。」「將現代史上的黑暗面完全公開，只會產生助力。」早在 1971 年，當時的西德總理布蘭德（Willy Brandt）訪問波蘭時，即向受難者紀念碑下跪求恕，率先揭開德波和解的序幕。反觀俄羅斯葉爾辛刻意迴避，僅派特使費拉托夫赴會，費氏只在會中象徵性的對史達林的罪行予以譴責。一般認為，葉爾辛之所以未在華沙出現，乃一方面因當年蘇聯紅軍隔岸觀火，見死不救，對波蘭人民英勇起義未給予道義上的奧援，很丟顏面；另一方面把這些侵波暴行一概歸咎給蘇聯共黨政權，與當今的俄羅斯政府毫無干系。很明顯地，蘇德同是二次大戰的入侵者，德國繼承了納粹第三帝國，勇於承認戰爭罪行；而繼承蘇聯的俄羅斯，卻還不肯面對血淋淋的歷史事實。

日本態度令人費解

戰後，德人勇於面對歷史教訓，極力推展歐洲睦鄰政策，幾乎每個邦都設有政治教育中心，免費提供相關書刊，讓年輕一代清楚認識過去歷史和現在環境，毫不隱瞞，甚為可取。反觀，今天的日本政府，不僅刻意要迴避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面，而且還有意扭曲歷史。歐洲各國互信互賴，邁向統合，而東亞國家則相互猜疑，日本唯我獨尊，日人該多反省。

資料來源：《香港聯合報》，1994 年 8 月 5 日，頁 16。